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动因、路径及对策

高 萌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百年变局下，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的战略框架基本成型。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对华政策中较为凸显。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动因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中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差异及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需求；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主要路径为打造意识形态联盟、推广普世价值观、推动泛意识形态化。为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有效应对美对华意识形态新挑战的战略对策，巩固意识形态主流阵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争取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大国竞争

中图分类号：D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1-0026-07

收稿日期：2024-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KS024）：西方主流政党的困局与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YJ2025S20）：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研究。

作者简介：高 萌（1997-），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1.004

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未来安全论坛”（The Future Security Forum）上发表演讲称：“在中国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或合作，因为这是一场与真正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① 斯金纳的言论似乎在呼应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中美关系视为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遏制被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手段之一。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即对华进行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2017）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形成长远挑战和威胁。② 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竞争》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进而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③。美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诬称中国希望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对立的世界。④ 拜登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大对华遏制攻势，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竞争色彩愈发突出。近年来，拜登政府积极打造全球“民主峰会”，意图以西式“民主价值观”为内核，掀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⑤ 美加强对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斗争，组建“西方国家联盟”，意在稳固和扩大价值观输出，这既是其对华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也有回应美国内政治现实的因素考量，最终目地在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一、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动因

遏制理论由乔治·凯南于1946年提出，最初被理解为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在意识形态上遏制西欧的共产主义。⑥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遏制是美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将苏联视为共产主义

①Joel Gehrke，“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April 30，2019.

②④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

③The White House，*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October 2022.

⑤王剑锋：《美国“民主峰会”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挑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第99页。

⑥Moritz A. pieper，“Containment and the Cold War：Reexaming the Doctrine of Containment as a Grand Strategy Driving US Cold War Interventions，”*Inquiries Journal*，Vol. 4，No. 8，2012，p. 1.

的代表，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相冲突，因此，有必要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历届美国政府都把“同化”对手制度作为遏制战略的最高目标。[①] 思想理论、价值观成为美国攻讦、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②] 苏联解体后，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美国“西化”的首要目标。然而，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未成功“改造”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渐没落，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焦虑不断上升，认为崛起国必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因此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遏制策略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日益明显。

（一）“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强调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③] 它源于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导和主导地位，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这种思想观念认为西方的文明、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是优越的，强调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具有普世性，是全球其它地区应当模仿和追求的典范，而忽视或贬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在“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的推动下，美西方国家积极向其他国家推广其“自由民主”。然而，美西方等国家的“民主移植”导致了部分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甚至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等理念也不过是霸权国家控制弱国、建立国际霸权体系的幌子。[④] “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即固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当前，国际社会的东西方、南北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分布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导致了意识形态竞争的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传统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和排他性逐渐暴露，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开始下降。美国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代表，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自身相对优势的减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试图通过加深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差异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统治阶级为了欺骗和使权力关系具有合法性的产物。”[⑤] 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变革总是与国家政权更替和制度变迁联系在一起。[⑥] 意识形态作为可转为对抗与冲突的武器，成为影响不同性质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较量长期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这两个竞争者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手段去征服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之战。[⑦]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缘于中美之间的社会制度存在根本性差异。首先，经济制度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其核心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生产关系上，美国的企业通常采取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而资本所有者则通过投资获得利润。中国的经济基础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允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中国的生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政治制度差异。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

---

①陈航辉、綦大鹏：《权力斗争、民主和平与地缘政治：美国遏制战略的思想根源》，《美国研究》2024年第3期，第40页。

②李帅：《意识形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第94页。

③庞卓恒：《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指向》，《理论导报》2015年第9期，第35页。

④Mariam Ali Rafik Abdessalem，The End of the West：Are We on the Brink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Aljazeera*，June 20，2024.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5页。

⑥赵欢春：《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6页。

⑦Ellen Meiksins Wood，*Retreat from Class：A New “True” Socialism*，New York：Verso，January 17，1999，p.48.

政治制度，即总统制的联邦共和国。美国的政治体制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分支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最后，意识形态差异。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矛盾，使美等西方大国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压。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一种普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总摆脱不掉一定形式的意识形态。① 制度之争和道路之争深嵌于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框架中。

（三）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实质是为了夺取和控制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② 意识形态遏制作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牌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严重，党派之间的对立加剧，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社会分裂加深，国家治理效能低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日益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高利率环境持续，民众被高通胀困扰，政府债务不断膨胀为美国经济埋下隐患。③ 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虽然仍然较高，但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使得美国的优势相对减少。美“民主灯塔”形象无法对应其对内失灵、对外失效的现实，这使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吸引力有所减弱。美国实力并非绝对的衰落，基于大国博弈的现实考量，意识形态“武器化”成为美国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和手段。

美国长期以来将自己视为全球的“领导者”，并认为其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是全球的典范。中国与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却实现了快速发展，并获得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在美实力相对衰落的对照下，美国担心其全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国当权者把大国竞争描绘成意识形态之争，旨在为其政策提供道德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团结国内力量，简化复杂的国际关系，以便获得盟友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很大程度上被描绘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美国将对手定义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以此来构建战略竞争的框架，从而服务于其总体国家战略规划。

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构建了以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任何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国家或民族都被“安全化”为敌人，被认为是对西方世界的安全威胁。④ “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等因素构成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深层逻辑。

二、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路径

自2016年以来，美不断升级对华进行抹黑、攻击和对抗。如：炒作“境外势力”“干涉”其大选；通过其资助的智库无凭无据宣扬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陷入“债务陷阱”；资助外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性的报道，在别国开展“妖魔化”中国的宣传。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策略，其目的在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阻滞中国的发展。基于这一目标，美利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打造意识形态联盟，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推广“普世价值观”，将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世界唯一标准；推动泛意识形态化，将非意识形态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立。

---

①王振华：《论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西欧研究》1990年第1期，第1-2页。

②王晶：《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与中国应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5页。

③熊茂伶、胡友松：《美国经济数据背后的近忧与远虑》，新华社，2024年1月31日，http://www3.xinhuanet.com/world/20240131/6e7f892e093e42be83e04a236afd9b83/c.html。

④唐爱军：《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第133页。

（一）打造意识形态联盟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面竞争对手，通过夸大意识形态差异、鼓吹政治制度威胁，试图以价值观为核心，在国际上拉拢盟友、建立排他性集团阵营，打造对华遏制的意识形态联盟。如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四国机制（QUAD）和五眼联盟（FVEY）等，都是美国利用意识形态搭建的小多边主义同盟。[①] 拜登上台后将“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着重构建意识形态联盟，强调发挥美国民主体制的优势，以团结民主体制国家。[②] 2021年12月，拜登政府主办首届“民主峰会”（The Summit for Democracy），号召“全球民主国家反对威权主义”。“民主峰会”至今已举办三届，其邀请国家的标准并非按民主评级而是根据美国的政治利益。[③] 如印度、菲律宾等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列为民主倒退的国家，以及安哥拉、刚果等被评定为“不自由”的国家仍被获准参加“民主峰会”。“民主峰会”打着民主的旗帜，将意识形态工具化、武器化，以美国自身标准将各国划分等级、分裂国际社会。通过“民主峰会”，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协调立场，共同推动政策议程，包括但不限于人权、透明度、反腐败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旨在通过集体行动来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试图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民主”成为美联结盟友、伙伴国及其他亲美政权的纽带，拜登政府妄图通过意识形态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④] “民主峰会”作为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的一项重要设计，意图以“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组建伪“多边”联盟，捆绑其盟友和伙伴以降低单独对华竞争的成本，同时也借此机会增强对华竞争的战略布局。

（二）推广普世价值观

美国历届政府重视“普世价值”的推广，将其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通过将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模式塑造为“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代议制民主等，从而试图将此作为全球的治理原则。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帮助战后欧洲国家重建，同时推广其政治和经济体系。冷战结束后，“普世价值”的推广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⑤]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促进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在克林顿两届任期内，美致力于“全球民主化”，将民主输出作为美国政府机构的基本职能。[⑥] 小布什政府时期，基于对美式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自信，美进一步升级全球民主化战略，并利用反恐战争颠覆一些国家的政权，重点地区之一是中东地区，推动部分国家的“美式民主”重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意识形态色彩相对弱化。特朗普政府时期，他更强调“美国优先”，价值观输出方面成收缩态势。拜登上台后，意识形态被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美更加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

以硬实力为后盾，美国强势推广“普世价值”。美利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干涉他国内政，策划“颜色革命”甚至采取军事行动、发动战争，进行民主输出。“普世价值观”的推广并不基于其具有普世性，而是基于美国世界霸主的确立。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远超其他国家；冷战后，美国更是成为唯一霸权国。美国家经济、科技及军事力量的遥遥领先为其价值观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美国拥有传播“普世价值”的物质基础保障，包括语言、有线电视网络、计算机互联网、对所支持国家的经济援助等。[⑦] “普世价值”的推广为美国的霸权行为塑造“合法性”和“正当性”。通过打造“普世价值”，美国将其意识形态塑造为唯一真理，形成排他性，将自身标准塑造为世界标准，从而为扭曲、打压、遏制中国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推动泛意识形态化

---

①孙蔚、吕奕骅：《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本质、特征及对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第95页。

②Hal Brands, Charles Edel, A Grand Strategy of Democratic Solida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 1, 2021, p. 30.

③Matthew Knott, Congo in, China out: Biden's democracy summit guest list raises eyebrow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2021.

④王剑锋：《美国“民主峰会”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挑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第100页。

⑤冯峰：《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战略意图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第130页。

⑥罗艳华：《美国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与现实困境》，《人民论坛》2021年第35期，第40-41页。

⑦谢晓光：《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3年第13期，第25页。

美国推动对华“泛意识形态化”遏制，以价值观对抗为核心，打造全方位排华体系。泛意识形态化即意识形态的“泛化”，是指片面强化甚至曲解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即在各个领域和议题中过度强调或滥用意识形态。泛意识形态化在国际关系中可能表现为过度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对立。美国推动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将大国竞争由非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差异被扩大化、绝对化。① 美国频繁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攻击，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污名化、妖魔化攻击。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还将经贸摩擦问题、科技问题以及金融问题“泛意识形态化”，作为打压遏制对手的“武器”。如：将使用美国技术的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加强出口管制；建立针对中国的科技联盟；等等。拜登上台后，他持续以泛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对中国经济和技术领域进行打压。如：以“侵犯人权”为借口，意欲拉拢盟友打压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② 将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权”和“民主”相捆绑，称“美国政府致力于打击滥用技术和数字专制主义的蔓延，并打造新兴技术以确保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③ 美对华的打压行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以价值观对抗为核心，在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全方位打造排华体系。④

三、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应对策略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是服务于其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整体国家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冷战时期，美国将强调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中，将战略基础建立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对立上，并且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和平演变”。尼克松曾坦言：“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⑤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将中国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遏制社会主义的影响力，长期对华实施封锁和孤立政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忧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长期警惕，美并未放弃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甚至试图通过缓和的方式对华“改造”，即在经济接触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⑥ 21 世纪初后期，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实力的增长，特朗普政府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并在拜登时期逐渐成型。当下，美国战略界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强度将不断加码，未来放弃意识形态遏制的可能性不大。在牢牢把握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本质的基础上，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掌握主动性，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争取国际话语权。

（一）巩固主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⑦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即试图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阻滞中国的发展，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否定、削弱和动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⑧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首先，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美国对华进行意识形态遏制是为了夺取和控制意识形态领导权。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共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得以渗透和扩散，导致社会思想领域的严重混乱，进而影响了苏联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加速了人民信仰的崩塌。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

---

①魏志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7 期，第 132 页。

②朱荣生、陈琪：《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权力博弈还是安全驱动》，《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6 期，第 66 页。

③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Abid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Renewal at Home and Abroad*，March 29，2023.

④孙蔚、吕奕骅：《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本质、特征及对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8 期，第 93-94 页。

⑤[美]里查德·尼克松：《1999：战而不胜》，朱佳穗等译，北京：长征出版社，1988 年，第 86 页。

⑥王晶：《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与中国应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⑦《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12 页。

⑧徐建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意蕴》，《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24 页。

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其次，深化马克思主义学习，加强理论武装。在分析和研判各种社会思潮时，我们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深入、客观地分析问题，避免片面和主观的看法。最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之中，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精神保障。[①]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完善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体系。为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初始阶段得到有效遏制。首先，加强法治化建设，完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框架。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手段打击和防范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其次，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要设立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标准和机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要全方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此外，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最后，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提升网络安全技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美国利用其高新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肆意妄为，监控全球网络，对华进行网络攻击。为减少西方敌对势力通过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加强网络技术创新，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维护网络安全。

（三）争取国际话语权

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与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国际话语方面还不占优势，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中国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应该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我们要坚持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增进国际交流，反对霸权主义。其次，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创新传播手段。我们要积极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增强跨文化沟通能力[②]、完善专业知识和培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③]；创新传播手段，运用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积极讲好中国故事，有力反驳针对中国的负面舆论，有效遏制针对中国的污名化、妖魔化行为。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更有效地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更好地应对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

针对美国基于霸权思维的意识形态遏制战略，我们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认清其本质是遏制中国的崛起、阻滞中国的发展，即所谓国家追求权力的动机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④]。中国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在办好自己的事情基础上，以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对立和文明冲突。[⑤] 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⑥] 我们要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多边合作和国际交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只要坚持沟通、

---

①韩叶、方世南：《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新华日报》2023年6月6日。

②蓝博：《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路径探析》，《对外传播》2024年第7期，第45页。

③毛倩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路》，《人民论坛》2024年第14期，第89页。

④[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杨岐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0-203页。

⑤倪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第27页。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求是》2022年第21期，第25页。

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①] 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审视双边关系，深刻认识到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超分歧，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致力于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实现共赢发展，并在全球性挑战面前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结　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与变化。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复杂性和影响力远超两国之间的范畴。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未来，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美国通过打造意识形态联盟、推广普世价值观、推动泛意识形态化等路径，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遏制。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国必须积极探索有效应对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战略对策。我们要巩固意识形态主流阵地，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和化解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要争取国际话语权，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治理理念的理解和支持。在应对美国意识形态遏制的同时，中国也应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分歧，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The Causes, Path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merica's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of China

GAO Meng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great-power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adjustments.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view China as a long-term competitor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US'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of China is the decline of Western-centrism,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social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strategic need to maintain America's global hegemonic status. The main ways for the US to contain China's ideology are to build ideological alliances, promote universal values, and promote pan-ide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to respond to the new challenges of US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of China, consolidat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position, safeguard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Key words: ideology; Marxism;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责任编辑　常伟]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页。